

G0744/2003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一百二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我与程潜的交往	肖作霖(1)
从沈重宇的经历看武汉“新左派”的斗争	沈元加(37)
刘治洲生平	佚名(51)
雷洁琼在抗日的峥嵘岁月	水世铮(53)
我在中国	陈必第(68)
抗战期间威尔基特使访渝见闻	陈海亮(78)
周佛海在最后的日子里	沈 醉(83)
北平《平明日报》概述	杨格非(104)
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业	李文杰(129)
终生研究资本论的漆琪生	黎缙维(137)
洪帮渊源、组织及帮规	王 涛(153)
张治中生平大事记(下)	余湛邦(192)

我与程潜的交往

肖作霖

作者肖作霖先生生前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，抗战期间一直在程潜手下工作，与程交往十分密切。本文系周全同志于1984年4月专程采访肖先生数日后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。

一、初次打交道

早在1938年，程颂公（即程潜）在河南担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河南省主席（按当时国民政府的建制，省主席同时还兼任省军管区司令和省保安司令）时，我就被派往他那里工作，开始是担任省军管区政工处长，就地招收了一批高中学生，办了一个抗日军政训练班。已经学了两三个月了，想继续办下去，学半年。讲老实话，我当时对抗日大业还是有点雄心壮志的。

当我第一次见程潜，请示关于这个军政训练班问题时，他一声不吭，严肃得很。也许由于他当时正在痛骂一位临阵脱逃的高级军官，余怒未息；也许他是厌恶我这个黄埔学生，甚至怀疑我创办这个训练班是否为了帮老蒋来控制什么？因此，他对我毫不客气，一点面子也不给。简单地问了几句之后，就说：“不办了！结业算了！”

当时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也不想多说什么。回到家里，左

421

1

想右想也想不通。这天晚上，接到一张请帖，是程潜请吃饭，我没有去。我年轻时，火气也是蛮大的，当时 28 岁，已是少将，自认为还是混得不错的，对这个训练班也煞费了一番心血。想不到他程颂公一句话，说不办就不办了，真是有意见。因此，不想再去讨没趣。当时，我对这位老资格的顶头上司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

过了几天，何皓若来看我。他也是湖南人，当时担任河南省财政厅长。他说：“那天，颂公在宴会上还问到你哩！问你为什么没有去？颂公难得称赞人，对你却很称赞哩！说你肖某人讲话不啰嗦，而且很有条理，印象很好，要我来找你去，跟他谈谈。”我说：“既然训练班不办了，还怎么谈？”因此，我还是没有去，我想起那天他骂人的样子，心里就有些胆怯，不愿也不敢去闯那个“头七”。

训练班结束前，我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请示，由于是程司令官的意见，老蒋也不便说什么。事情办完之后，程潜又派人把我找了去。这一回不再谈训练班的事了，尽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。这时，我才发现他不但会骂人，而且会谈天，骂起人来尖酸挖苦，令人难受；谈起天来妙语连珠，令人彻夜不倦。

慢慢地，我们就越谈越投机了。我对他谈起 1927 年宁汉分裂的事，当“四·一二”老蒋叛变后，我是很不满意这位校长的，当时曾从黄埔分校跑到武汉来投奔武汉中央，因此，也算是个左派。我谈起这一点，程潜很感兴趣，他问：“当时，你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很赞成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赞成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冒着风险步行赶来武汉？”他又问：“现在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现在，国共两党不又携手合作、共同抗日了么？这就是贯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嘛！”对于我的回答，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赏。

当时，他对于团结抗战的态度是很真诚的，当发现我对老蒋也有不敬之处后，他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对我很信

任，很放心。他兼河南省军管区司令，任命我当省军管区参谋长，把他的图章也交给我代印代行，等于就是让我当了军管区司令。这是程潜一贯的作法。他是大将风度，从来不屑于过问那些琐碎的行政事务。

当时，蒋介石曾来电指示，要我把训练班的全部学生带到桂永清的教导队去，由桂永清任教育长，我任副教育长。但是，程潜不让我走，要我在第一战区任民训处长，同时兼任河南省军管区参谋长。从此，我就成了他的亲信。河南省军管区下辖 14 个师管区、16 个团管区，他都交给我管，我这个人个性很强，不适于当幕僚，不适于当别人的参谋长，但跟他却很合得来。

程潜见我对办训练班仍饶有兴趣，就亲自批准在河南省办了一个训练班团，专门训练县以上的骨干，由他亲任团长，我任副团长兼教育长。至于这个团如何办？办在哪里？他是从不过问的。我也很少过问，也学着他的样把班团一切事务委托给副教育长去全权处理。因为，当时军管区司令部在南阳，而训练班团在鲁山，我作为兼参谋长只能跟司令官在一起，住在洛阳；而且，我还兼任了《郑中日报》社的社长，尚且从未去过，就更无暇顾及这个训练班团了。不过，由于我热衷此道，在每期训练班团结业典礼时，还是要赶去致词合影一番的。

说程颂公有大将风度，是指他善于用人，善于发挥部下的长处，很信任很放手地让你去干；他一看中你，就大胆使用，“用人不疑”，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。有一次，他和李宗仁在南阳会晤，李宗仁问他：“河南省军管区在征兵和训练新兵方面是全国最好的，诀窍何在？我想领教领教。”程潜说：“我搞不清楚。”李宗仁又问：“参谋长是谁？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他？”程潜又说：“问他？他也不一定了解。”李宗仁奇怪地问：“那怎么会成绩如此之好？”程潜笑道：“可能这就是诀窍吧？凡事只有放手让下边去干，才能干出名堂的。”他说这话是有道理的，并不是有意装糊涂，而是自矜自己用人有本事，我也是学着他的办法办

事的，把他的图章和我的图章都一古脑儿交给了担任副教育长的副处长，我也养成了和他一样的作风。（即凡事很信任人的作风。他连过去一度有宿怨的人的亲信都能信任，都敢信任，比如晏勋甫以及后来的邓介松，都是唐生智的人，但也同样是用而不疑的。）因此，后来胡宗南曾称赞说：“作霖兼职，多多益善。”意思是我兼职越多越好，不怕事情办不好。殊不知我这点本事正是学来的。

二、程潜的特殊性格

程潜对所用之人只看主流，不拘小节；我当时年轻，喜欢玩，一坐上麻将桌子就是一个通宵达旦。有一次，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晏勋甫说：“要打个电报催作霖回来。”程潜说：“不要催，他玩够了自然而然就会回来的！”他看人看事是有把握的。

平日，他不管具体事情，一有空闲就是写字、或静坐、或念佛、或作诗。他是位儒将，喜欢游览。洛阳有个白马寺，朱镇南将军就经常陪他去游玩，有时邀我一道去，我们都穿长衫，潇洒得很。他又是位大将，只管大事，从不看批公文。平日我们开会，他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抽雪茄烟，一不过问，二不参与讨论。当散会时，他问：“讨论得差不多了吧？”我们说：“讨论完了，您老人家还有什么指示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于是，他就和愿意留下来陪他熬晚的人谈天了。主要是和晏勋甫等人谈，谈古、谈诗词歌赋，还谈子平之术，谈得眉飞色舞、津津有味。其实，我也算个健谈的人，但对他们所谈之道却不甚了了，甚至不懂，因此，很少能插上嘴。但又不便贸然走开，只好陪着旁听。他讲话蛮有风趣，谈兴蛮浓，讲来讲去就变成他一个人包揽全场了。他经历复杂，见多识广，谈得起劲时，别人都插不上话。

他这个健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当湖南省主席时，还是如此。当时，我和邓介松每天都陪他一起吃中饭，边吃边谈。他不讲究

吃喝，特别喜欢吃皮蛋，我们3人坐上桌时，皮蛋碗就放在他的面前。晚餐，有时我们回家吃，有时是别人请我们去赴宴，他就只剩一个人吃，也就无法交谈了。为什么没人请他吃饭？谁敢请他呢？都认为他不怒而威，严肃得令人骇怕。其实，他并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平日不喜欢演讲，却喜欢谈天。不过，他谈天是要选对象的，对看不起看不惯的人，他是不屑与之谈的。有一次，到河南来开会的一些湖南籍黄埔同学贺衷寒、袁守谦、刘运尧、邓文仪等想见见他。因为，当时袁守谦想当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，而程潜保荐的却是李世璋。由于李世璋思想比较左倾，陈诚从中作梗，蒋介石不肯下委任状，而委派了袁守谦。程潜很不满意，不想见袁，也不让袁到差上任。一个执意要见，一个坚持不见，袁守谦几次找到我，使我左右为难。因为，袁守谦是黄埔同学，又邀了这么多同学一起来见，无非是想缓和一下彼此间的矛盾，但程潜却推说没时间，拒而不见，我只好大胆作主引他们到客厅坐下，说他们都来了，是来看看老前辈的，还是要见见才好。程潜没有办法，只好出面接见，但是，他一句话不讲、像尊木菩萨一样坐在那里。大家向他致敬问好，他绷着脸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大家只好快快告退。我只好心怀愧疚地请他们一行到中山公园吃茶，表示陪礼，大家笑一笑分手。还有一次，河南军区几个处长因为从没见过他，想看看，他不置可否，我便写了几句话，叫人家一起来见，他也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。他的意思是你们不是要看我吗？那就请看吧！让你们看个够。当时，弄得几位处长也十分尴尬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，事后都说他可敬而不可亲。其实，我觉得他是很风趣、很可亲的。

程潜自恃甚高，对于军事学，理论上造诣颇深，自认为是学得最好的。当时，陆军大学的校长杨杰也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军事家，但就是怕程潜的军事学。他们俩都是留日同学，杨杰还当过程潜第六军的师长，平日坐在一起讲起蒋介石，认为蒋根本不懂军事，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！

程潜平日常穿中山服，不穿西装，不吃酒，抽烟是抽雪茄。他书读得好，诗做得好，字也写得很好，因而自命不凡，大家也很敬重他、推崇他。他自己鄙视老蒋，喜怒形诸于色，却告诫我对蒋系亲信不要锋芒太露。后来，李世璋由于北伐时当过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的秘书，与邓演达的关系也颇深，而且倾向共产党，因此终于没有当成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。程潜为了安插这位自己信得过的老部下，特意因人设事地成立一个政训处，让李当处长。明知李是左倾拥共的，却仍然重用，说明程是真心拥护国共合作的。程对我器重的原因也是这样，认为我是黄埔学生中难得的人，认为黄埔学生必然反共，而我却对蒋不满，确实难得。

最后，袁守谦还是当上了政工部主任，他也会做诗、会写字，慢慢地跟程潜也合得来了。加之，袁是长沙人，谈起天来就更加乡音亲切了。这却使我有些为难起来，因为，袁守谦的政治态度是与我们相反的，当时与共产党名为合作实际上常闹摩擦，程潜照例是“不亲庶务”不探闲事的。于是，袁守谦和李世璋之间，政工部与政训处之间常有矛盾。后来，把李世璋调为机要处长，仍然时起风波。有一次，李世璋根据机密情报，开出一份进步人士的名单要我负责保护，而袁守谦却不买账，我与他们二人都不得闹翻，只好从中调和。下面的人不了解我的苦衷，都说我袒护左倾分子，好在我与袁守谦私交甚厚，他也不便得罪我。像这样的保护名单不止一起，形势紧张时，李世璋就通过程潜交给我，说：“这些人，你适当照顾一下他们。”我有了程潜这句话，就不怕袁守谦作梗了，当时，我的实权比袁守谦大，尽管他的地位要略高一些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我这种政治态度，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。因为，我当时是河南省复兴社的头头。（全国的总头头是蒋介石。）我们复兴社主张民族至上、国家至上、军事第一、胜利第一、力量集中、意志集中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、一个主义。但参加复兴社的动机则因人

而异,并不全是反共的,相当一部分还是真诚希望复兴民族的。我们的口号就是“复兴民族,准备抗日”,这并没有错。别人认为我是复兴社头头,就一定是镇压共产党的,其实我是同情他们的。

三、光复前后几经变迁

1939年,程潜升任天水行营主任,名义上指挥5个战区。即:一战区卫立煌(河北),二战区阎锡山(山西),五战区李宗仁(河南),八战区朱绍良(甘肃)、十战区蒋鼎文(西安)。连阎锡山都要向他请示,打电报要称“职阎锡山谨上”,“呈主任程”。看起来权威很高,实际上是个空架子,行营的副长官是卫立煌,与程潜就合不来,对于这些名位权力,程潜看得颇淡,他大智若愚,不去计较,落得一个清闲自在。

1940年,他这种无为而治的态度似乎有些转变,似乎想有所作为了。当时,他奉调回重庆,接替李济深出任战地委员会主任委员,这时我正任平凉师管区司令,他打电报叫我到西安,想带我到重庆去出任他这个委员会的党务组长。他的计划很大,准备还要成立政务组、军务组等等,组下还要编处。问我的意见如何?并说:“你现在的职务不要辞,先安排一个接手的,等我到重庆后再电召你去。”我听了当然高兴,准备跟他回重庆大干一番,这是一个国共双方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机构,的确是大有可为的。

但是,当他一上任,才知蒋介石早已委任了各组负责人。党务组长是方觉非,中央委员,河北人,北伐时当过郭沫若的政治部副主任,资格很老,有他这位大驾在,我就无法问津了。军务组长是黄××,黄埔一期学生,资格也比我老。政务组长的位子说是留给程潜委派,但也未轮到我,而派了方凯敏。方当时的政治态度也是反共的,后来湖南和平起义他没有参加,而去了广州担任政务部次长……。至此,程潜原先的想法全部落空了,非常

气恼灰心。当时，他为什么想让我出任党务组长？因为他想我对黄埔系好做工作，他是想团结方方面面共同抗日的，这也体现了他的大将风度。

在重庆，他最讨厌 CC 系的人。有一次，陈立夫来看他，他不见。陈立夫是陈英士之后，对程潜来说，陈立夫是晚辈，不肯见他也无可奈何。在河南期间，我帮程潜把 CC 系全压下去了，这使他非常满意，这也是他对我器重的原因之一。

由于战地委员会各组处骨干仍为 CC 系所把持，程潜感到鞭长莫及、尾大不掉，干脆又是什么事也不管，天天打麻将。因此，我也就未去战地委员会工作，开始是到中央训练团，后来到兵役部当司长。有时，我去上清寺看他，讲到蒋介石独断专行，用人不当，他就劝我不要再多管闲事，说：“这类事情，你我都是没有办法的，何必去多事呢？”

程潜不管事的态度，正中蒋介石的下怀。蒋生性多疑，不仅对程潜，对其他人也如此。比如，我到兵役部之后，鹿钟麟部长知道我是黄埔系学生，而国民兵役司司长一职向来是由蒋介石派黄埔系学生担任的，鹿怕派一个难于共事的人来不便驾驭，便主动保荐我出任。于是，蒋就犯疑了，找我去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认识冯玉祥的？”我说：“不认识”。蒋又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认识鹿部长的？”我说：“是在洛阳，与程颂公、鹿部长一起吃过饭认识的。”蒋这才默默地点头，由于是鹿钟麟亲自保荐，蒋也只好同意了。从内心里，他是不想自己的学生去投靠别人，为别人所用的。

抗战胜利后，程潜的态度仿佛又有了一些变化，竟然出任武汉行辕主任。这是一个指挥对共作战的机构，我以为他是不会去当的，但他还是去当了。这回是贺衷寒、袁守谦先我而去见他，由他们保荐我当他的参谋长，而程潜却拒绝了，说：“肖作霖是不乐意做这个事的，他也不适宜做此事。”

的确，他很会用人，知人善任，表现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人。

反蒋时用我，而亲蒋时则不用我了。这时，我给他介绍唐纵当他的参谋长，他接受了。唐纵当时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工作，在重庆时曾监视过程潜。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，唐纵的六组是主管军宪特的，唐曾经问过我：“程潜与毛泽东见面谈些什么？他跟你谈过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最近我和颂公根本没有碰过面，谈了什么内容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唐纵和我在黄埔六期是同期同学，他是湖南人，比我大4岁，和我有一定交情，相互比较信任。这个人还是有一点正义感的。他过去在戴笠手下当过书记长，后来当蒋介石的侍从参谋、六组组长，管军统局，戴笠都要听他的。他曾问我：“程潜可靠不可靠？”我一时不好如何回答。因为，我可以骗他，但他如据此以骗蒋，则非同小可。于是我只能说：“颂公那个人你也知道，就和我一样，对宋、孔、陈是不满的；对校长嘛，现在相处关系好一些，而过去是长期敌对的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你要是相信我，就该相信他，不会不反共的。”

我这样回答，无疑是很策略的。

当时，唐纵不想在侍从室六组干了，想调出来，依托程潜当个湖南或湖北省主席。因为，程潜有这个资格，王东原就是由程保荐当上湖南省主席的。

程潜同意我的推介后，要我代他写个签呈给蒋介石。他知道：如果保我当参谋长，蒋会怀疑，如果保唐纵则不会怀疑。不过，后来唐纵也没有当成这个参谋长，而是另有高就，出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了。

当时，程潜出任武汉行辕，是对形势估计问题，也可能舍不得一定权位。我主张他不去就任，不如静待时机，但他未以为然。当然，他也并不是积极反共，他没让我当参谋长，因此，我没有参加三年内战，抗战一胜利就退役了。当时，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将，要60岁才能退役，而我30多岁就退了。退后在南京办《大众报》，不赞成打内战，办了一年多即被关闭了。

四、协助程潜竞选始末

1948年春，我回湖南，经过武汉时，正好遇上程颂公准备竞选副总统，他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准备打电报找你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，因为已经退役了。”他说：“不是要你干军事，而是……有人劝我竞选副总统。”我惊异地问：“这个时候了，您还去撑他老蒋的面子？去凑蒋的趣？我不赞成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你与邓介松去谈谈看。”

竞选这件事，从头到尾都是邓介松主持干的，他个子不高，像个白面书生，个性强，却活泼，也是谈笑风生的。他是湘乡人，一贯是个左派。当我问及竞选之事时，他说：“不是什么去凑蒋的趣。而是……蒋的局面不会很久了，当副总统的人有可能取蒋而代之。”我说：“蒋在短期内是不会死的。”他说：“不一定要他死，而是要他自动让位引退，而程颂公资望很高，湖南的黄埔学生也很多，有力量。”当时，我觉得他讲得有一定道理，但又不无顾虑地说：“这种可能性是很渺茫的，况且，我们现在也没有钱去搞竞选，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有人出钱，四川的汤文华、湖南的王东原，李默庵都肯出钱。”

不久，我回到上海，程潜打电话要我去南京，而且要我把小轿车也带去，意思就是要去他那里去住一段时间。开始，我对这件事兴趣不大，因为，蒋介石对黄埔学生控制很严格，我不想锋芒太露，何必树敌太多？所以，我只答应帮程颂公在上海照应照应，不想去南京。但后来还是要我去了，我的车也被杨继荣“骗”去了，把另外一辆车还我。杨继荣当时在武汉行辕当交通处长，管事务，这个人个子高，长得结实，黑黝黝的，很会应付里里外外。他把一部坏车还我，说补我一些钱，却一直未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当时，程潜为了竞选，组织了一个中国政治学会，主要台柱

子有邓介松、邓飞黄、罗中凡等人。邓飞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，又是老资格的左派人物，和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，为程潜竞选出了大力。初选时，程的得票并不少，比于右任要多，仅次于李宗仁。后来，蒋介石要孙科出马，要黄埔学生都支持孙科。这样，激怒了程潜和李宗仁，李宗仁来看程潜，程决定把自己的票全部让给李宗仁，认为自己反正不能出了，不如让李宗仁出，也算是对蒋一种反抗。结果，尽管 CC 系和黄埔系大都支持孙科，但还是不及李宗仁的票多，李宗仁终于当选了副总统。而程颂公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回到湖南出任长沙绥署主任兼省主席，这也是他的生平宿愿。

光复后，他之所以出任武汉行辕主任，与其说是对武汉感兴趣，不如说是对湖南感兴趣。过去几十年间，他曾几次主湘，但都是转瞬即逝，被人挤走，于心是不甘的。他这个人政治雄心还是有的，为桑梓效力的观念并不是很淡薄的。1939 年下台离湘后，在上海隐居 7 年，并非淡泊的 7 年，而是反蒋的 7 年。是有所图谋的。光复后，他之所以据武汉，之所以保荐王东原任湖南省主席，之所以对不认识的唐纵马上同意其要求，都是有他的打算的。他想以两湖作基础，将来待机应变。因此，他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甘心附蒋反共，他的主任是个空衔，与李先念部队发生摩擦都是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进行的，与他的关系并不大。

竞选失败后，蒋给他一笔钱，拉拢他，还要利用他牵制李宗仁。当时，白崇禧坚持要程让出武汉，程并不肯让，蒋介石也不愿意。但是，没有办法，桂系有力量，只好将程调长沙主管湖南江西两省，程也愿意去。他派我先回湖南打前站，对我说：“没有一个地盘是不行的，我在上海反蒋 7 年，也没有反出他的手掌心，到湖南去就有个落脚地方了，还是跟我一道回家乡去吧！”我当时还有些犹豫，认为自己在上海有一定的基础和朋友，他又说：“湖南是个最好的基地，还是跟我回去打好这个基础。”我同意为他去走一趟再说。

开始，程并没有打算自己当省主席，他保荐李默庵，但有人反对，又保荐黄杰，还是有人反对，这才自己出马。

李默庵当时任南通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，常到上海来，家眷也住在上海，我与他交往和交谈较多。谈话中，他流露出对蒋介石相当失望的情绪，内心倾向共产党。程潜竞选时，他不仅出钱，而且出力。他虽是陈诚的老部下，但与陈并无特殊关系。虽是黄埔一期生，而且是起来比较早的将领，但湖南人最终得不到重用，只有依靠颂公，拥戴颂公。平日，他比较小气，但对资助颂公竞选却很慷慨。落选后，他想趁此机会回湖南，加之自己有一定威望，因此，同意出任省主席，蒋介石也同意。因为，蒋不能不尊重程潜的意思，既然程管两省，难道不能保荐一个湖南省主席么？

黄杰和李默庵一样，是黄埔一期同学中仅次于胡宗南的重要将领。最初，胡宗南是第一师师长，黄杰是第二师师长，也算是起来得比较早的，但后来有段时间冷落了一阵。他是长沙人，字达云，是位风流儒将，喜欢模仿蒋介石的姿势走路，也喜欢写字做诗，字写得有自己的风格，诗则不如袁守谦。当时，他的思想倾向并不如我和李默庵，但表面上却与我们一致，也是想借助颂公之力回湖南当省主席。他没有在军政部讲武堂呆过，因此并不是颂公的学生，关系并不亲密，有事就通过我与颂公沟通，表示回湖南后都用颂公的人，只说：“我只用一个秘书长朱景云，怎么样？”

但是，由于贺耀组等湘籍人士坚持反对，李、黄二人主湘之议均未能实现。湖南的CC系和三青团、在乡军人会等也都蠢蠢欲动，有阻程回湘之说，这不能不引起我这位打前站的人的深虑。

一天，我们几个人在陈明仁家吃中饭。他的大师傅会做菜，特别是牛肉弄得好吃。我们一行七八人都是黄埔学生，都有同样心情。我有心在饭席上提出来搞一个联名帖子，表示“团结拥

程，回湘应变。”当时，大家都一致赞成，有些人可能注意力不在此，因而对这8个字无印象。但事后杨继荣对我说过：“颂公看了这份名帖很高兴，还在上面题了几个字哩！”

这也说明，程潜回湖南是想有所为的，也是很有政治嗅觉的，是下了很大决心的。说他“无求名，勇拂绩”，只是谦逊之词。我当时也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，我还想走第三条道路哩。我当时想撇开蒋另立旗号，就必须与美国人挂钩，开始美国人也曾考虑过程，在这方面跟我也有一点点关系。

傅泾波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，司徒雷登很喜欢傅，傅在司徒面前也能起一些作用。在重庆时，一些燕京大学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傅，当时并无多少来往。到了南京上海之后，来往多了。这时，我们都住在国际饭店，在交谈时谈到程颂公欲去湖南。为此，傅曾主动地找我两次。这个人平日谈时局是从不表态的，这次却问我关于程潜的情况。当时，美国人想换马，对李宗仁并无把握，认为李在黄埔学生中没有威信，因而想到程颂公。我对傅说，程资望高，无派系，是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，各派系都能接受。傅说程没有军队。我说：他虽无军队，但在军队中影响大，黄埔军官中有一部分是他的学生。而且，程懂政治，最会运用，凡事心中有数。最理想的是他对共产党也有优势，他是真心拥护三大政策的。虽然大革命失败后也曾反共，但过去与共产党不是百分之百的敌对，这就是优点。缺点就是无实力，还来得及武装嘛。我们湖南有的是兵，就是武器成问题。傅认为那不难，只是来不来得及倒是个问题。当时，他们美国方面对战局比我们清楚得多。因此，他们知道来不来得及的问题。

后来，在我的建议下，程潜礼节性地去会晤了一次司徒雷登，司徒雷登也来回拜了他。我没有参加，但傅泾波都在场。事后，傅告诉我说，会见所谈都是礼节性的，又问我们回湖南后有什么具体打算？我说不出来，只说：“能保乡土就算不错了，要有

大作为则必须自己建军，至少需半年时间。”傅认为来不及了，在这方面来说程是不如李宗仁的。因此，后来我们与美国人并没有具体谈，也没有很明显地去找美国人。不过，这种思想倾向也是很自然的，也不完全是为了走第三条道路，第三条道路也是走不通的。

当时，我确曾想过：程颂公如果有二、三十万人基本队伍，就可以取蒋而代之。湖南兵源不成问题，军官也多如牛毛，就是没有饷械，没有时间。我对傅泾波说：回湖南后有什么情况，我再联系，但后来并无联系。因为，时局发展太快了，的确是什么也来不及了。后来，国共和谈期间，我也没有再去找傅，颂公与美国人也再无联系。如果当时实现划江而治，说不定我还会去联系的，事实证明，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然而，在我们回湖南之前，有这样一些“过场戏”还是有利的。不但有黄埔系“团结拥程”，而且有美国人前来“问津”，怎么不好呢？

五、浩浩荡荡回湖南

当时，我搞这些事的目的是想大造声势，浩浩荡荡回湖南。我还造出舆论，称程是湖南的“家长”，加上有这么多“天子门生”拥戴他，就显得特别有力量。其实，程并无一兵一卒，但声势却很强，想藉此压住 CC 系和黄埔系。当时，湖南的 CC 系是由张炯把持，是反对程潜回湘的。在湘的黄埔系三青团由李树森控制，李虽然也是程讲武堂的学生，但程对他印象不好，李对程也有疑惧，不想程回去。湖南的在乡军人联合会则由长沙警备司令掌握，他准备纠合数百军人到火车站挡驾，给程一个下马威。因而，当时的形势对程主湘是很不利的，我不能不未雨绸缪，早作防备。

我和邓介松先行回湘后，做了许多工作：首先利用我们的声

势压住了李树森，他这个黄埔一期生怎抵得住我们众多的同学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这一批人都拥程，你怎么办？”李树森见此情景也只好转变态度，我又解除他的顾虑，只要他拥程，我们不会亏待他。接着，邓介松利用他与CC系头目的关系，做了一些疏通工作，张炯等也就偃旗息鼓了。最后一个蒋伏生，我与他私交颇好，也不难对付了。

蒋伏生也是黄埔一期学生，为人脾气很坏，平日穿长褂、拿蒲扇，像个学究，但为人却很残暴。过去捉住逃兵都是用腰斩处置的，惨不忍睹。当时，他的警备区管半个湖南，又是在乡军人会会长，出于反共的本能，他们不同意我们回湘。抗战胜利前，蒋介石很信任他，打算任命他担任铁道兵司令，消息传出很久了，却迟迟不见委令下达。蒋伏生迫不及待，他头脑简单，也弄不清蒋介石和唐生智貌合神离的内窍，竟恳请唐生智在见蒋时“便中一询”，代为打听。这一来，使蒋介石大为恼火，以为蒋伏生投靠了唐生智，决定立即撤销前议，而且从此不再让蒋伏生充任带兵官。蒋伏生后悔莫及，从此极力反对唐生智，处处与唐系的人作对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。于是，又得罪了唐生智，弄成个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。我了解他这段故事，对他启示说：“如今你又反对颂公，岂不四面树敌么？你总得依靠一个人嘛！”他说：“颂公能重用我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担保不会降你的职。”这才稳住了这个冒失鬼。

我和邓介松在长沙活动了两个星期，各方面工作都做好了，报馆舆论界也取得了一致认识，这才打电报给程潜，请他莅湘上任。

但是，程潜是个嫉恶如仇的人，他不喜欢的人就不肯买账。我曾极力笼络李树森，向李许了愿，说颂公回来了，不会对李怎么样，还许他出任保安副司令。但程潜却不同意，不肯见他，也不肯要他。我认为李是一期生，老大哥，不能亏待，就带他去见程，程却理也不理。这使我很为难，使李树森也很尴尬。只好辞